

新
叢書 74

反文化

亂世的希望 與危險

COUNTERCULTURES: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彌爾頓·英格 著

J. Milton Yinger

高丙中、張林 譯



反文化 亂世的希望與危險

*Countercultures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彌爾頓·英格 著
高丙中、張林 譯

譯者簡介

高丙中 男，一九六二年生，北京師範大學博士，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於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主要著作及譯作有：《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滿族的社會組織》，《面具的奧秘》等。

張林 男，一九六四年生，北京師範大學外國文學碩士，譯本書第六章。

J. Milton Yinger

Countercultures: the promise and the peril of a world
turned upside-down

©1982 by The Free Press

©1995 Chinese copyright

by LAUREATE BOOK CO., LTD.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USA)

in association wit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前 言

在這樣一個盛行有人歡呼有人失望的溫和主義的時期，對反文化（countercultures）的研究可能顯得有點不合時宜。這本書的標題也許會使一些讀者聯想到某個歷史片斷，並推測我有再現六〇年代或更早的一代人的意向。如果他們讀完此書的印象不過如此，那麼，我的意圖無疑是徹底失敗了。我寫此書是想說明各種反文化絕不就是一套一套奇奇怪怪卻毫無意義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而是社會變革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它們產生的後果可能是破壞性的，也可能是創造性的。如果審慎地看待它們，對它們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我們就能發揮其潛在的創造性；否則，我們就會激發其潛在的破壞性。

不止一個學科涉及到生活的許多方面所呈現的二元性（dualities）、倒置（inversions）、矛盾（contradictions）、對立（oppositions）和倒退（reversals）。因此，我循著這些問題從做為我的專業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走進了其他社會科學如心理學、歷史學、宗教學和哲學等相當熟悉的領域，並且，我還涉足到一些我以前只是做為一個訪客、一個旅人或消費者而瀏覽過的領域。我的文學藝術素養整個來說屬於典雅型，我的音樂素養則更接近巴哈，而不是搖滾樂曲。

無論是選擇例證，還是闡釋現象，評述觀點，錯誤在所難免。我會為此而遺憾。但是，如果我沒有能夠體現多角度地審視

反文化的初衷，沒有在審視中進行這個論題的整合，沒有揭示它的穩定的關係，那才會引起莫大的遺憾。

儘管這主要是一本分析性的著作，但是，我也毫不猶豫地闡述了自己的傾向。我不能「放逐價值」（“valuefree”），在做出自己的分析和評論時，也不佯裝騎牆。這一點讀者諸君將不難印證。當我合情合理地闡明自己的價值觀時，我總是力圖使讀者理解我的價值觀在什麼意義上，從什麼角度介入了討論。

寫這麼個東西的念頭好幾年前就在我腦子裡萌發了，不過，那時它還只是一篇關於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的論文——現在成了本書的主腦。在書稿逐步形成的過程中，我的論題就越來越廣泛地涉及到時代危機。大家有目共睹，在我們面前擺著三個密切相關的巨大難題：如何在不同國家、不同階級、不同人種、不同民族以及兩種性別、多種年齡層之間增強正當性？如何贏得和平，取消有組織的和官方的做為解決爭端之手段的暴力？以及如何保護環境，扼制人口膨脹、資源濫用和各種污染？人類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人們已經擺出了一些試探性的姿態。但是，人類現存的各種社會制度似乎無力做出迫在眉睫的重大改革。這些制度必須攪得天翻地覆嗎？或者說，注定要努力這樣去做嗎？——近幾十年急驟的社會倒退正是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我希望，本書對反文化的研究將引導大家用富於創造性的方法而不是充滿偏見的方法來對待這些問題。

很多讀者會留意到我的副標題之一部分——「被攪亂的世界」（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採自《聖經》。這段在中世紀新教運動的短劇和漫畫中非常流行的典故曾被希爾（C. Hill）恰到好處地借用到他關於英國革命的著作《被攪亂的世界》（*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中。甚至就在我寫這篇《前言》的時候，我還看到揚克洛維奇（D. Yankelovich）的一本書的廣告，該書題為《美國人生活中的新準則：在一個被攪亂的

世界裡尋求自我實現》(*New Rules in American Life: Searching for Self-Fulfillment in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儘管它被頻繁使用，但是它尚未變成老生常談，仍不失為一劑清涼散，能夠提示出文化挑戰和變遷是我們要竭力試圖理解的強大力量。本書意在對這個古老而又激動人心的短語進行系統的分析。

副標題的另一部分——「希望和危險」(*The Promise and the Peril*)——借自考克斯(H. Cox)的一篇極有價值的文章，該文題為〈變動的東方：新東方主義的希望和危險〉(*Turning East: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the New Orientalism*)。這個短語替我們表達了人們對待許多反文化現象的矛盾心態。一說到採用語詞——它們經常表示出生活的矛盾和倒置——表示這種二重感覺之間的巨大反差，八〇年代的人們就會想起核查部(the Ministry of Truth)在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年》是如何負責官方謊言的。它的口號是：戰爭是和平；自由是奴役；無知是力量。這種顛三倒四與我們將要討論的某些反文化如出一轍。不過，或許其他反文化會顯得希望多於危險，它們甚至包括在精神上接近瓦澤曼(D. Wasserman)的 *Man of La Mancha* 之所言：「當生活本身顯得失常的時候，誰知道什麼是瘋狂，什麼不是瘋狂？太清醒或許就是瘋狂……把生活看成它所是的那樣而不是它所應該是的那樣則是狂中之狂。」

本書的寫作歷時多年，其間還穿插進來其他項目。非常感謝全國人文學科資助會惠予我一項學習和研究獎學金，感謝劍橋大學惠予我一項訪問學者獎學金，也感謝奧伯林學院的准假。除了曾與許多參與當代反文化或對它感興趣的人交流之外，我還有幸利用了伯克利加州大學、劍橋大學、夏威夷大學和奧伯林學院豐富的藏書。我希望，腳註和參考書目不僅表達了我對成百位反文化者和反文化研究者——這兩種身分並不一定總是互相排斥的

——的謝忱，而且對讀者的進一步閱讀或許不無助益。

特別感謝愛達·麥卡錫（Ada Macarthy），在某種意義上是她費力整理了草稿。我也感謝美國社會學會，它允許我使用了我以前為《美國社會學評論》寫的兩篇文章中的一些段落，它們是一九六〇年的〈反文化和次文化〉（Contraculture and Subculture），一九七七年的〈反文化和社會變遷〉（Countercultures and Social Change）。我從讀過部分或全部初稿的同事和朋友的想法和建議中受益匪淺。我尤其要感謝 G. Simpson、S. Cutler、R. Casson、S. Johnson、J. Yinger、N. Yinger、M. Blecher 和 R. Longsworth 的批評。我特別要說的是，溫妮·英格（Winnie Yinger）曾以她特殊的方式為本書煞費苦心。

約翰·彌爾頓·英格（J. M. Y）

奧伯林（Oberlin），俄亥俄（Ohio）

一九八一年五月

中文版序

大約八年前，當這本《反文化》脫稿時，我希望它能在讀者中起三個作用：

(一)為各種反文化下定義，並指明它們的種類及其在世界上的發生範圍（既包括現在的，也涉及過去的）。

(二)證明反文化做為人類經驗的一個方面，即使不是普遍的，也是廣泛的。

(三)描述並闡釋形形色色的反文化的結構的、文化的和個體的根源。

基於這三個目標，我希望我發展了這樣一種關於反文化的理論：當人們試圖解釋一些曾令人大惑不解、倍感迷惘的人類事件時，人們能從中有所借鑑。我也希望它是這樣一種理論：其他人可以在它的基礎之上建立一種關於社會變革的更有說服力的一般理論。

我的思考也涉及到道德層面、策略問題。讓我以提問的形式表述這一點：我們能夠通過對反文化的分析性的和富於同情心的研究發現重要的指導方針（既包括肯定的，也不排除否定的）以幫助我們創造一個更人道的世界嗎？如果我們還想針對在這樣一個突然顯得狹小了的地球上發生的快得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做出創造性的反應的話，那麼，對於反文化的研究確實顯得至關重要嗎？我們能夠學會建設性地處理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和人類相互之

間不斷增強的依賴性嗎？

在什麼程度上我的著作達到了預期的目標，這將由讀者諸君來評判。我在這裡只想強調，反文化——它們遠不只是六〇年代席捲美國和西歐的一種孤立的現象——已經見之於並將繼續見之於世界上的許多地方。請看下述例子：

中國、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一些青年通過他們對來自西方的搖滾音樂和其他文化形式的狂熱勁表達了對社會變革的企求（這不排除它們對這種音樂本身的內在興趣）。

一些反文化中的否定性的和破壞性的形式仍然甚囂塵上。恐怖主義（terrorism）——我在書中已經簡要地討論過——仍然堅持他們綁架和殺害非戰鬥人員的權力。恐怖主義者爲了奪取權力，或許也爲了顛倒佔主導地位的文化價值，總是不擇手段。恐怖主義興起於其他尋求變化的策略不見成效之時。

各種反文化的宗教羣體仍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投身其中，正如它們幾千年來所做的一樣。對早期基督教的研究澄清了它的反文化因素，特別是羅馬統治者所認爲的、從帝國宗教的角度來看的反文化因素。那麼，對早期佛教的研究是否也將對它向印度、中國等地的原來的宗教的挑戰得出一種同樣的解釋呢？

在過去幾年裡，美國出版了幾本關於六〇年代反文化運動的著述。它們使人們相信，這段時期出現的公社、宗教的流行、「言論自由」運動、強勁甚至不乏暴力的反對政府、學校和公司等的政策的抗議都是歷史上的一些新東西。然而，事隔二十年之後再來看，它們更清楚地顯示了反文化是自然而然的現象。只要人們既定的行爲方式、祖宗的正統、現行的權力結構被一些個體看作是不合理的、殘酷的、不公正的和醜惡的，反文化就可能異軍突起。與此同時，它們則被看作幾乎是戰無不勝的、迫切需要的，因而是能造成急劇變化的反對勢力。

美國的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一直處於相當保守的時期。儘管如

此，反文化也沒有完全隱形遁跡。它們以稍顯柔和的調子發出自己的聲音；其中有些則活躍在歷史舞臺的後臺。但是，對於一些美國人來說，仍然有相當強程度的失意、苦悶和異化感。我相信，這些感情必將導致對「使世界天翻地覆」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的越來越急切的呼喚。

我很高興高丙中先生對本書的理解並樂於將它譯成中文。我希望本書中文版的問世能夠在關於中國反文化的歷史和現狀的研究中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我毫不懷疑對中國此類問題的研究有助於中國和世界的同仁更好地理解社會變革的進程，有助於我們發現其他人羣中的破壞性反文化和建設性新選擇的一些根源，並進而有助於我們有根有據地探尋各種人道的社會。

約翰·彌爾頓·英格
奧伯林，俄亥俄州，美國
一九八九年一月

譯 序

十三年前，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在大洋彼岸鑿鑿有據地寫道，「任何將允許人類在幾代人之後仍倖存於這個星球上的文化，都必然已經吸取了大量反文化因素——一套與現在流行的主導價值觀和規範根本不同，並且常常直接對立的價值觀和規範。無論你指的是個別社會，還是指世界各地廣為採用的標準，概莫例外。今天，容不下反文化的社會是脆弱的，正如歷史一次次所示；面對急遽變化的環境，它必然顯得僵硬、遲鈍。」一個能夠容納反文化的社會必然是一個能夠最大限度地匯集一切新生力量的社會，也肯定是一個充滿活力和朝氣的社會。比較一下大陸和台灣十多年前與今天的社會狀況，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意識形態以至整個文化的寬容給中國社會注入了令人振奮的強性和活力。這一逐漸趨於寬容的過程蘊含著衝突，也孕育著希望。不難理解，當我們讀到這段引文時自然會「於我心有戚戚焉」。

上述引文出自英格（J. Milton Yinger）的《反文化：亂世的希望和危險》一書（見本書邊碼第 15 頁，下同）。在六〇年代的西方，反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以其形形色色驚世駭俗的價值觀和行為令世人矚目。自此以來，對於反文化的調查研究成為西方特別是美國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在過去的三十五年裡，反文化人士的自述和自我標榜、正統人物的口誅筆伐以及學者的研究報告在各種傳播媒體中層出不窮。在衆多的研究者中，英格既是始

作俑者，也算得上集大成者。他最先把「反文化」做為一個頗具概括力的學術概定提出來（見其“Contraculture and Subculture”，載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October 1960, pp.625-35），後來又在反文化研究的熱潮冷卻下來的時候，以較為公允的態度吸收他人的成果，綜合運用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心理學、文藝學、符號學等的觀點和方法高屋建瓴地論述了形形色色的反文化和反文化的方面，於一九八一年完成《反文化》這部大作，迄今無有出其右者。

英格於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生於美國密西根州（Michigan）的昆西（Quincy），先後在 DePauw University、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獲得學士（1937 年）、碩士（1939 年）、博士（1943 年）學位，他的第一專業是社會學，其次是經濟學和人類學。他從一九四一年在俄亥俄州 Ohio Wesleyan University 任教，一九四七年在改換到該州 Oberlin College 擔任教授，直到一九八七年成為該學院的終身教授。在這一期間，他還兼任密西根大學、夏威夷大學、華盛頓大學的客座教授。英格還是一位熱心於學術組織工作的學者，曾經擔任美國社會學會的秘書（1971～74）和主席（1976～77）。

英格教授在學術上非常活躍，先後在美國的一百所大學和英國、西德、比利時、匈牙利、南斯拉夫、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的大學講學授課。除了《反文化》之外，英格教授的主要著作有：《為權力而鬥爭的宗教》（*Religion i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Duke Univ. Press, 1946; 1978 年由 Arno Press of the New York Times 重印）、《種族的和文化的少數民族》（*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與人合著，初版於 1953 年，第五版於 1985 年由 Plenum Publ. Co. [企鵝出版公司] 出版）、《邁向行為的場理論》（*Toward a Field Theory of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Hill, 1965)、《宗教的科學研究》(*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Macmillan Publ. Co. 1970; 1989 年出日文版)。他還出版了另外七部書，發表了八十篇文章和九十篇書評。

「反文化」不是文化虛無主義，不是否定抽象的文化本身。準確地說，「反文化」(Counter-cultures)應被理解為「逆反的文化」。英格教授給它下過一個簡潔的定義，他說，反文化是「一套屬於某個羣體的規範和價值觀，並且這種規範和價值觀與這個羣體所屬的社會的主導性規範和價值觀尖銳衝突」(邊碼第 3 頁)。他又說，「只要一個羣體的規範系統包含一個基本的、與社會主導價值觀相衝突的主旋律，並且其成員的心態、需求和觀念都直接捲入了其價值觀的發展和保持；只要這個羣體的規範只有通過參照它與周圍主導社會和文化的關係才能被理解，那麼，使用反文化這個術語就不為失當。」(第 22 至 23 頁)

反文化是相對而言的，不針對某種既定的主導文化也就無所謂反文化。人們出生在一個社會中，接受既定文化的薰染而被社會化。然而，任何既定的文化都不是萬能的，由於時過境遷，文化中開始出現越來越不能回答的問題，社會上存在越來越多不能滿足的需要，加上一系列結構和互動的、個人的和文化的原因，一些人與既定價值觀和規範契合的努力受到了阻滯，在痛苦地體驗困惑、迷惘、幻滅之後，他們轉而否定現有文化的可行性，頂著社會的壓力，有時要冒著自我毀滅的危險去開創一個適合他們的文化天地。所以，英格教授說，「反文化是沒有土著的文化」(第 42 頁)，「一個人不是被生於一種反文化中，而是後來投入其中，幫助形成它，以反抗他本來的文化」(第 47 頁)。六〇年代歐美的青年運動是針對以白人中產階級的標準為核心的主導文化的，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反對以儒學為正統的封建文化的，所以，它們被視為反文化。

反文化的相對性還表現在時間上。英格教授說，「在確定反文化時，時間觀念是至關重要的。正如以前被接受但現在已萎縮或蟄伏的價值觀可能會被當作反文化性的一樣，眼前的有些逆反規範說不定以後哪一天就被吸收進主導文化中去。」（第 36 頁）基督教在對抗羅馬帝國的官方文化時，它是反文化，可是，它後來成為國教的時候，它卻是主導文化。

根據上述界定來觀照世界歷史，我們看到，反文化並不限於六〇年代歐美青年的造反運動。反文化不是特殊的、個別的、偶然的事件，而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是人類經驗、社會生活和羣體文化的一種組成部分。在人類歷史上，社會的內部衝突和文化危機是無數的，由此出現的反文化也不勝枚舉。有奇奇怪怪的反文化，例如，十九世紀七、八〇年代俄國的一些青年男女，他們懷疑、嘲弄社會生活中普遍接受的信念和受到尊重的習慣，他顛倒各種傳統，甚至達到外觀的細枝末節（男髮越長越好，女髮越短越好，等等）；也有嚴肅的反文化，例如交戰國的和平運動。人類社會多的是曇花一現的反文化，也不乏任重道遠的反文化，例如早期的基督教、本世紀初中國的新文化運動。

各種反文化是千差萬別的，它們發生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不同羣體之中，並帶著不同的宗旨以不同的面目出現。怎樣評價它們？怎樣對待它們？在當今世界可謂人言人殊。在七嘴八舌的議論中，有兩種人的聲音特別響亮。一種人義憤填膺，他們說，仁慈的上帝啊，為什麼要有這麼多不合時宜的人和事物？他們是乖戾和悲哀的淵藪，他們把我們攪得四分五裂。另一種人額手稱慶，他們說，感謝上帝給了我們別具一格的人和事物，如果沒有這些，這個世界將是多麼僵化和平庸啊！他們才是真正富於創造性的。前者把「反文化」用作一種貶義詞，用它表示缺乏教養、古怪、荒誕、墮落、異端或叛逆。在後者眼裡，「反文化」意味著不同凡響、絕處逢生、希望、創新、拯救，意味著這個令

人窒息的 world 的新鮮空氣，意味著這個危機四伏的時代的文化曙光。

英格教授的立場是中立的。他說，「稱某種事物是反文化的，既不表示對它熱情歡迎，也不表示對它強烈憎惡。」（第 35 頁）他要求自己從客觀的立場出發把反文化做為社會緊張的顯示器和社會變遷的晴雨表看待：「反文化是緊張時期對幫助的呼喚，是文化維繫系統、神話和象徵等功能紊亂時的呼救，是信仰失落而又似乎不太可能失而復得時的不甘絕望。」（第 9 頁）他認為反文化是一個焦點，通過它可以透視許多重要的社會問題和理論問題。舉其犖犖大端而言，它們是異化與社會紊亂，佛洛伊德和其他深層心理學說關於個人潛在世界的理論，社會化與社會控制，青年羣體與一般意義上的年齡羣體、代際衝突及其原因和後果，大眾社會、公社、革命、現代化與反現代化，社會分層、社會偏見、社會隔離與被統治者的反抗，以及集中反映上列各個方面的社會變遷。一葉知秋。作者研究反文化，並不止於對反文化本身品頭論足。這是一個真正的學者應有的思想深度。

反文化是一種社會力量，它們既有所摧毀（甚至經常摧毀一些不該摧毀的），也有所培植（包括鮮花和荊棘）。我們研究它們，其中的重要目的就是趨利避害。英格教授在本書〈前言〉中寫道，「我寫此書是想說明各種反文化絕不就是一套一套奇奇怪怪卻毫無意義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而是社會變革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它們產生的後果可能是破壞性的，也可能是創造性的。如果審慎地看待它們，對它們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我們就能發揮其潛在的創造性；否則，我們就會激發其潛在的破壞性。」

反文化特別活躍在社會文化急遽轉變的時期。我們恰逢其時。怎樣理解人言人殊的各種反文化？怎樣接納反文化的有益內容以發揮其建設性？這是英格教授的興趣之所在，也應該是我們關心的問題。在吸取反文化的活力以推動社會發展與不被反文化

的衝擊毀滅之間把握恰當的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唯願我們知難而進！譯介英格教授的這本《反文化》，就算是為我們自己的研究工作做了一點鋪墊。

高丙中

北京大學中關園

一九九四年五月一日

目 錄

前言·····	i
中文版序·····	v
譯序·····	ix
第一章 反文化：希望或危險·····	3
第二章 反文化的定義·····	27
第三章 反文化的多種根源·····	73
第四章 形形色色的反文化·····	125
第五章 善，文化的與反文化的·····	161
第六章 美，文化的與反文化的·····	183
第七章 符號反文化·····	211
第八章 處境不利者的反文化·····	243
第九章 反文化的制度：政治·····	265
第十章 反文化的經濟制度·····	291
第十一章 反文化的宗教·····	311
第十二章 反文化的家庭和性規範·····	347
第十三章 反文化的教育·····	373
第十四章 反文化與社會變革·····	391
參考書目·····	429
人名索引·····	469
名詞索引·····	501